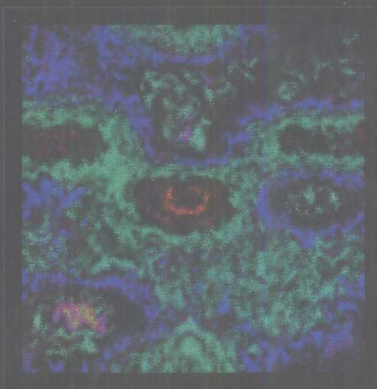


中國邊遠地區開發研究



潘乃谷 馬戎編

中國邊遠地區開發研究

潘乃谷 馬戎 編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mbay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4

中國邊遠地區開發研究
潘乃谷 馬戎編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香港銅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城大廈十八樓
ISBN 0 19 586581 2(中文繁體字版)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前記

費孝通

我作為「邊區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研究」的課題倡議者，首先應當說明一下提出這個課題的原委和想法。

我一向認為中國的社會問題中，最基本最嚴重的是人口問題。70年代中期，農村已明顯感到人口的壓力，引起了當局的注意，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的政策。農村體制改革開始，實行了家庭承包生產責任制。但人口已經如此龐大，怎樣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尋找出路，成了當時農村裏的急迫的問題。

1982年我對當時的人口問題提出了做「兩個眼」的意見，即如果要搞活人口這盤棋，必須要做兩個「眼」，一是發展小城鎮，一是開發邊區。從此，在「六五」期間開展江蘇小城鎮研究的同時，提出了「邊區開發」的研究。在此期間我國東西發展的不平衡問題，進一步引起了我的注意，加深了對這一問題研究的緊迫感。到1986年「邊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研究」課題由我牽頭列入了「七五」國家重點項目。

我是這個課題的學術指導，任務是「破題」和「開路」。我親自到內蒙古、甘肅等省區的一些地方進行實地考察，提出具體的研究課題，講清它的意義和進行調查研究的方法。然後由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負責人潘乃毅、馬戎等負責組織具體調查工作，分別為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定題、定人、定點、定任務，規定他們必須進行實地調查，根據取得的第一手資料編寫論文。五年來他們完成了多項研究課題，現將他們所

寫的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匯集成這部學術專著，這本書不僅代表了他們努力的成果，而且實現了我們培養年輕一代教學研究人員立足本國、聯繫實際、深入基層做調查工作的願望。

一

我很想借這本書出版的機會，根據我本人在中國民族研究工作方面的經歷，表述一下我在這個研究領域裏的思路。

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繁榮和進步是我國解放以來一貫奉行的基本國策，它影響到我國「四化」建設的大局，關係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繁榮昌盛。何況目前民族問題已成為世界上突出的矛盾，在歐洲尤為尖銳，這會為人類帶來多大的危害性現在還難說。因此民族研究的意義已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民族研究工作是我不一生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的社會調查工作就是從少數民族開始的。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民族調查可以說是認識社會和文化的基本功，要認識人類的社會與文化的基本面貌，最好能從對各種不同民族的社會與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入手。有比較才有鑒別。對不同個性的綜合分析才能得到共性的認識。

1935年我在清華大學研究生院攻讀人類學，導師史祿國先生在我畢業後準備出國深造時，要求我先找一個同自己生活習慣不同的少數民族社區進行實地調查。我接受他的建議並在他的指導下和前妻王同惠選擇了廣西大瑤山地區的花籃瑤人作為調查對象。王同惠在此次調查中不幸犧牲，我也受了重傷。這次調查計劃沒有完成，我所搜集到的關於各村瑤人人體測量數據，後來又全部遺失，我只根據王同惠的調查材料，寫成一本《花籃瑤社會組織》。其後我在回家鄉養傷時進行了「江村」調

、

查，轉向了農村調查，直至解放之初。

1950年我參加了以宣傳新中國的民族政策和對各地少數民族進行初步調查為任務的中央訪問團，並擔任貴州分團和廣西分團的團長，深入貴州和廣西兩省的少數民族地區工作，有兩個年頭。1952年我調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1955年到貴州進行民族識別研究，1956年參加了人大常委會組織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這一段時間大約有七年之久，我一直和國內各少數民族發生接觸和聯繫，並且有機會進行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到1957年反右運動時才告終止。

又過了二十多年，到80年代初，我恢復了正常的社會地位，並以《三訪江村》重新開始我對社會調查的工作。就在這時我提出了上面提到的為中國人口這盤棋做活兩個眼的觀點。其中之一就是開發邊區，看到了民族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再次點燃了我對民族調查的熱情。1984年我初步完成江蘇省的小城鎮調查後，決定把研究重點轉移到邊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以後着重做了農牧結合和城鄉結合兩個題目，進而產生了「全國一盤棋」的觀點。民族研究成了我們社會學研究中的重點項目之一。

從此我利用一切條件在大江南北，東西穿梭，每年多次在全國各省進行重點的現場調查。在這十二個年頭裏，除西藏和台灣外，我遍歷了全國各省，其中不少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區，所以有機會又和各地少數民族同胞往來接觸。我對中國民族問題的認識以及對民族地區發展的一些設想，其中許多是不夠成熟的，願意提出來和大家商酌。

解放後，我國消滅了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這是民族解放和發展的先決條件。首先在法律上承認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並在憲法上予以明文規定；同時主張各民族間堅持平等、互相團結合作以達到共同繁榮的目的。然

後在行政體制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些是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爲了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我國在各少數民族聚居地方，省一級的建立自治區，市、縣一級建立自治州、自治縣，形成了一套民族自治的行政體制。最後在1984年頒佈了《民族區域自治法》。這是把這種制度確定下來的一項基本法律。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貫徹執行得好，既有利於發揮少數民族振興中華的積極性，又有利於鞏固國家的統一。

建國後，我們民族工作中第一個碰到的問題是民族識別問題。各民族都有權利當家作主，憲法規定每個民族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裏應該有自己的代表。但是我國有多少民族，有哪些民族，各民族分別有多少人，聚居在甚麼地方等等，在開國之初，我們還不很清楚。中央派出赴少數民族地區的訪問團，初步摸清了情況，但是具體情況又相當複雜，有若干疑難問題，需要深入調查研究。因此民族調查研究不僅是個學術問題，而且是一項與國家的政策和行政建制密切結合的工作。

我們開始進行民族識別工作時，主要理論根據是斯大林關於「民族」的定義。斯大林的定義指出，一個民族有四個要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濟和共同的心理素質。這是個符合於在歐洲大部地區資本主義時代形成的民族實際的概念。一切概念都是從歷史的經驗裏總結出來的，總是同一定的歷史條件相對應的。我們在應用這個概念處理我國的民族實際時，常常遇到困難。

根據中國民族現實的客觀特點，我認爲「民族」這個概念本身應包括三個層次的涵義。第一層是中華民族的統一體。這個民族統一體在近代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帝國主義侵略中表現得十分具體和重要。清末民初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族共和」，實際反映了長期以來早已形成的這個民族共同體實體的存在。這

個統一體是經過長期歷史形成的，其形成的具體經過還有待我們去研究和說明。但是中華民族確確實實是一個民族統一體是不容否定的。

第二層是組成中華民族統一體的各個民族，即現在組成中華民族的 56 個民族。作為組成中華民族統一體的 56 個民族，各有自己的特點。所謂民族特點是一個民族從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適應其具體的物質和社會條件而產生的有別於其他民族的個性。在統一體的內部，應當承認各組成部分的個性，相互尊重，友好相處，以實現民族平等和團結。

第三層是組成中華民族統一體的各個民族內部還有各具自身特點的部分，現在稱作各種「人」，如我調查過的瑤族裏還有若干種不同名稱的瑤人，如花籃瑤和茶山瑤等。

由於民族這個概念具有中國特點，在理論上還需要更深入地研討，所以在民族識別上，還時常發生疑難問題，至今還有些個別情況難作定論。但總的來說，民族識別工作已基本完成。

民族調查和識別工作對了解各民族的基本情況，為少數民族參預人民政權及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建立民族區域自治，提供了必要的事實依據。同時進行的各少數民族的語言調查，為各少數民族改革和創造文字打下了基礎。

二

憲法既規定了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則，行政上又落實了民族區域自治的體制，接着是各少數民族分別根據其具體情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我國的少數民族，由於歷史原因，解放時所處的社會經濟水平差別很大。有人說幾乎是一部活的社會發展史，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直到各期的封建社會都可以找到活的標

本。但不論以哪個發展階段為起點，都要由他們自己進行社會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爲了解各少數民族社會的性質，1956年人大常委會主持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我在1956年參加組織這項調查工作。依據社會發展史上的幾個階段，作爲一個共同參照格局，定出各項指標來衡量每個民族的發展水平，確定它的社會性質。我們的目的是通過這次調查，國家可以對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民族，採用不同的方針政策，來幫助他們進行社會改革，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作爲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在這一階段的工作中受益很多，最主要的是接觸了實際，了解了情況，同時認識了不少問題。就我國少數民族發展、演變的歷史，我得一條認識：我們不能從抽象的定義出發，不能離開一定的歷史條件去了解少數民族的歷史和社會，否則就會偏離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既無法有區別地對待各種具體民族問題，又看不清各個民族發展的前途。可惜在這項工作過程中，我個人由於反右運動而被停止參加，未能有始有終地完成這項任務。但是這項工作本身是有成績的。雖然經過反覆折騰，在「文革」之後，留下的調查資料終於由民委編成「五套叢書」出版，爲民族研究打下初步基礎。

三

70年代末，我國跨入了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從80年代初，由於在政治上得到了改正，可以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和條件繼續做社會調查，力圖緊緊跟上社會大變革的形勢，盡力之所及爲研究我國當前的社會發展勾畫出素描和草圖，並跟着實際的發展不斷提出一些問題，開闢一些值得研究的園地。

1978年我從中央民族學院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1979

年中央決定重建社會學，指定由我主持這項任務。我在 1981 年完成了社會學學科的基本建設，隨即開始繼續我的農村調查，並且從沿海的較發達地區做起，這些都是漢族聚居區。所以，從 1957 年起到 1984 年的三十多年中我實際上沒有進行少數民族地區的現場調查。

我在全國各地城鄉調查中，看到了我國境內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沿海發達地區的開放和發展，勢必拉大和邊遠地區的差距。差距的擴大勢必會產生種種問題，而特別是我國的邊遠地區許多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區。這些想法促使我關切到民族地區前景如何的問題，激發了我對邊區少數民族的發展進行研究的決心。1984 年開始作出我研究工作重點的轉移；從沿海轉到內地，從東南轉到西北，從農村小城鎮轉到少數民族農牧地區。我內蒙古為重點歷訪五個自治區，又以甘肅為重點考察了邊區各省，最近又進行以發展山區經濟為重點的調查。從 1984 年起，至今有 8 個年頭，重新多次進入少數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的發展問題形成了一些觀點和設想。這些觀點和設想也為年輕一代的學者起着「破題」和「開路」的作用。

我在內蒙古和黑龍江最初遇到的還是人口流動這個老問題。內蒙古解放時只有 600 萬人，80 年代初是三個 600 萬，而黑龍江是三個 1,000 萬。就是 30 年中原有的人口佔三分之一，自然增長的人口佔三分之一，外面進入的人口也佔三分之一。我感到這是一個應由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及其他學科共同來研究的問題。人口流動是個現實存在的問題，要因勢利導，不能硬擋，發展這個趨勢的積極方面，防止與矯治其中的弊害。

首先我們應當找出不同性質的各種形式的人口流動，然後分析哪種流動會和當地社會發生哪些矛盾；再進一步觀察、了解矛盾產生和發展的過程，研究如何使人口流動為發展經濟文

化服務，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當時提出的研究任務。我們打算在一兩個省區開始作局部調查研究，探索經驗，逐步擴大到其他各省區，摸出大西北人口流動的總規律。

我們研究的目的還是在於開發大西北。開發大西北，人口是開發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力資源問題有兩方面：一是當地的力量應該怎樣使用，一是還需要吸收甚麼力量。要有全國一盤棋的觀點，從大局着眼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對人口流動問題的研究是從黑龍江省盲流問題入手，然後轉入內蒙古自治區。

四

我國西部邊區的一個特點就是它擁有廣闊的牧區。我國可以放牧的草原一共 43 億畝，佔我國土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主要就在西北邊區。歷來牧業是這個地區的經濟基礎，而且具有極大的潛力。從事牧業的又都是少數民族，從發展少數民族經濟的角度看，牧業的現代化更有重要意義。因此我認爲要研究邊區開發問題，應當從牧區入手。

以整個內蒙古來說，牧業是當地蒙古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主要傳統經濟基礎。但是它的南部又是與漢族雜居的地區，引進了農業，草在退化，牧業也在衰落。這裏存在農牧矛盾，同時也正是過去發生民族矛盾的地帶。我們就選擇了現稱赤峰市的昭烏達盟這個農牧交錯的地區作觀察對象。

赤峰成爲蒙漢雜居的地區，也是農牧並存的經濟，自清朝允許漢人出關之後，已有 200 多年歷史。由於外來粗放農業向牧區伸張，破壞了牧民生存空間的草原，農牧發生了矛盾。外地進入開墾的人都是背井離鄉的窮苦農民，他們是漢族人，牧民是蒙古族人，因而農牧矛盾轉化成了民族矛盾。

粗放農業和自然牧業的矛盾，以及長期的濫砍、濫牧、濫墾、濫採，使自然生態平衡遭到了破壞。開發這樣的邊區，首先必須用大力來恢復自然生態平衡。治沙、防風、種草、種樹是最基本最迫切的措施。這在西部其他地區也不例外。

目前在恢復自然生態平衡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了比較成功的經驗，但尚屬小面積的實驗性質，有待進一步作出配套的和可推廣的治理方案。從羣衆創造的經驗中，我們看到，開發邊區必須走以牧爲主、農牧結合的道路。而這條路只有打破目前牧區的封閉自給經濟狀態，實現牧業現代化才有出路。無論採用哪一種經驗，如建設飼草飼料基地以發展飼育，或採取放牧和舍飼相接力的方式搞「催肥工廠」等，都首先要解決牧業的商品化問題。商品流通是促使牧業改革的基本力量。

大力開發廣大草原地區的牧業，是我關心的又一課題。在內蒙古、新疆那樣廣闊的草原上，如果能大力發展現代化的牧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難以估計的。要認識這一點，首先須破除漢族傳統的「以農爲本」的狹隘觀點。要知道糧食只是人類得到營養的一種來源，肉類不一定是「副食品」，也可以成爲主食的。如果佔有國土三分之一的草原能充分得到利用，成爲全國人民肉食供應基地，就可以減少對糧食的需求，並使農區的土地能從糧食的壓力下解放出來，向培植經濟作物轉移。從宏觀上去看，這是一項提高國民生產力的大戰略。

五

如果說在赤峰調查中看到了該地區的自然生態的失調，在包頭的初步調查卻看到了過去在邊區建設的大工業所產生的人文生態的失調。人文生態是指一個社區的人口和社會生產結構

各因素間存在着適當的配合，以達到不斷再生產的體系。人文生態失調是指這種配合體系中出了問題，勞動生產率日益下降，以致原有生產結構不能維持人口的正常生活和繁殖。在整個邊區，人文生態失調和自然生態失調同樣值得注意。

自建國以來，國家工業建設的重點曾經放在中部和西部之間的走廊地帶，從內蒙古經陝西、甘肅到四川，投資大略估計有 3700 億元。在我們這樣一個工業不發達的國家，這個數目是不算小的。用這筆錢建成了 9 條鐵路和幾千個大中型國營企業。但是這幾千個大中型企業並沒有成為這個廣大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啓動力。這是為甚麼？

我們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看，基本上這是個人文生態失調的問題。在邊區所辦的大企業裏就能見到它們的特點。首先是「企業辦社會」，也可以說是「社企不分」。企業的從業人員和他們的家屬組成了一個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力求自給自足、對外很少聯繫的封閉性社區。這在少數民族地區更為突出。

這種企業又都直屬於中央或省的政府部門，他們搞的是產品經濟，不是商品經濟。它們和所在地的基層地方政府沒有從屬關係，當地基層政府管不了它們。企業的上級政府部門又都是專業性的經濟部門，它們也管不了各企業從業人員的社會生活。於是產生了「企業辦社會」的結構。一個廠長事實上同時是一個「市長」。這種社企不分的封閉社會，人文生態關係就容易失調。

這樣的企業像個大家庭，不能不代代地養活不斷增長的子子孫孫。這個大家庭並不是個不斷生長中的母體，而是個生產力受限制的封閉社區。所以不可避免地進入了惡性循環，包袱越來越重，母體越來越弱，這就是我說的人文生態失調現象。80 年代，沿海各省鄉鎮企業發展很快，由於缺乏技術人員，顯

出重價招聘。結果在這些大企業裏舒展不開手腳、待遇又微薄的技術人員就像春江水發大批東流。這等於是企業裏的水土流失，又成了一種嚴重的人文生態失調現象。

人文生態失調形成了對企業的壓力，有些企業不得不進行改革以求生存。首先是以開放代替封閉，向社企分離的目標邁進。大企業的開放不但發揮了邊區工業化的啓動作用，而且也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辦法。對地區經濟和企業本身是兩利的。

這個問題，實際是西部地區共同的問題。在陝西、甘肅、四川的「三綫」企業都面臨這樣一個改革問題。它們必須轉型以求適應。適應之道主要是以開放代替封閉，從產品經濟走向商品經濟。改革的方式則是多樣的。陝西寶鷄的經驗叫「城鄉一體化」，使國營大企業所含蓄的巨大科技潛力，形成了鄉鎮企業的啓動力。甘肅的經驗叫「一廠兩制」，擴散大企業的技術、資金的力量，開發了與地方結合集體所有的工業小區，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呈現一片生機。

這個改革過程已經開始，應該根據具體情況採取不同形式進行。應當承認這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關鍵是怎樣使已經存儲在西部邊區的巨大經濟能量釋放出來，使其成爲西部這個多民族地區共同發展的推動力。

六

中國的少數民族大部分聚居在中國的西部。西部和東部的差距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發展戰略考慮民族因素：一方面是動員這地區的少數民族參與這地區的開發事業，另一方面要通過這地區的經濟開發使地區的少數民族發展成爲現代民族。這個觀點在過去實際上常被忽視了。不少在少數民族地區

興建的大型國營企業根本沒有考慮到和當地少數民族聯繫，甚至眼中只有這地方的資源，而忘記了還有生活在這地方的人。

怎樣才能把西部少數民族吸收進開發西部的事業裏來，我在甘肅臨夏調查時得到啓發，主要是進一步認識到少數民族的發展必須抓住它們的特點作為起點。在臨夏，我提出「以商帶工」的啓動戰略。他們的農民流通部隊在城鄉間搞活了流通，促進了生產。我認為西部各地都要有這種販運隊伍，來點火啓動整個地區的經濟運行。

我考察這個地區回族的歷史，提出發揮回族人善於經商的優勢，搞活區域經濟。這個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更大的區域聯合的趨勢，需要更大的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四省(區)的協作設想應運而生。以河西走廊為主的黃河上游一千多里的流域，在歷史上就屬一個經濟地帶。善於經商的回族長期生活在這裏。現在我們把這一千多里黃河流域連起來看，構成一個協作區。我們提議建立12個大型水電站，以解決這個地帶的能源問題。水電產生能源，能源推動這個地區豐富的礦產資源的開發。通過資源開發帶動這個地區3,000萬人民的致富，從而促進整個區域的商品經濟的良性循環。這個經濟啓動的結果，將使這個協作區成為西北廣大少數民族地區一個經濟發展中心。

這個經濟中心的建立和發展，更長遠的意義就是重開向西的「絲綢之路」，通過現在已建成的歐亞大陸橋，打開西部國際市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部國際市場比東部國際市場更有潛力。西進中亞、西亞和中東地區，我們具有一定的條件。充分發揮回族的民族優勢，提供伊斯蘭國家所需要的各種生活用品，我們完全有可能建立一個很大的西部國外市場。

如何開發藏族地區是我一直關心的另一個問題，由於年老，